

目 录

編者的話	(1)
告狀記	(3)
打不贏的官司	(20)
五亩麦子	(41)
忘不掉的冤仇	(48)

編者的話

一、这套《农民家史》是为了配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了向农村讀者，特别是青年讀者进行阶级教育而編輯的。讀了这些真实的农民血泪史，就可以启发我們忆过去苦，思今日甜，进一步憎恨旧社会，热爱新中国。讀了这些阶级斗争的活教材，就可以帮助我們了解什么是阶级压迫，什么是阶级剝削，为什么要永远不忘記阶级斗争，为什么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二、这套《农民家史》計劃选編十五本，每本一个重点，如有的专门記述长工的苦难，有的专门訴說佃戶的痛苦，有的专讲高利貸对农民的殘酷剝削，有的专门控訴国民党反动派抓壮丁給农民带来的灾难，有的专门揭露地主豪紳勾結官府迫害农民的罪恶和阴谋……。总起来說是控訴地主阶级和反动派的罪恶，揭露旧社会的黑暗。

三、这套《农民家史》中的文章，大部分是农民口述，由其他人記录整理的，也有的是农民自己写的，感情真实，立場鮮明，讀起来亲切感人。这些文章都是从各地出版和編印的“四史”讀物中选拔出来的。本社在編輯过程中，增加了一些插图，做了一定的文字加工工作。

四、这套《农民家史》在选編过程中，得到了各有关的地方党委、各兄弟出版社和不少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我們非常感謝。

五、选編《农民家史》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工作。我們水平不高，經驗不足，缺点錯誤一定是不不少的，我們誠懇地希望讀者提出批評意見。

告 状 記

“衙門口，朝南开，有理沒錢莫进来。”“屈死不告状，餓死不惜賑。”这两句話，在豫西一带农民中間，流传得很广。这是广大农民群众，在旧社会里，通过无数次的亲身体会和悲惨遭遇，对社会生活得出来的总结，对旧政权和旧法律虛伪性的深刻批判。多少戶傾家蕩产，多少人茹苦含冤。多少穷苦群众，把那一線希望寄托在一张状子上，结果是海底捞月，变成泡影；多少人家为出一口气，跑遍了各州府县，到头来才从眼泪和咬碎的牙关上找到一条箴言，叫作：“有錢就有理！”

下边这段家史，就是讲一戶貧农和地主打了几年官司的痛苦遭遇。这段史实发生在河南省灵宝县阳店公社东水头村。这家貧农姓郝，男的叫郝天才，今年已六十多岁；他老伴叫王靜仙，也五十多岁了，现在是东水头生产队的貧农代表。

王靜仙娘家是灵宝县北观头村人。她十二岁那年，因为家里穷，被媒人哄騙着童养到郝家。她在家时，听媒人说婆家人口少，茶飯好。可是到了郝家一看，地沒一壟，椽沒一根，只有三孔破窑洞，一个鍋台。一床被子，已破烂得不象样子。王靜仙的女婿郝天才，全凭着一副豆腐挑子过日月，还要养活一个老翁。王靜仙看到这光景，虽然年幼还不大懂事，可是她哭了。她知道这个婆家和娘家一样穷，她也知道将来的苦日月，

就象手拿着一把圪针枣刺一样，要由她亲手捋到头。

郝天才虽然比她大十多岁，为人却忠厚老实，善良勤恳，平常待她象亲兄妹一样。“人心换人心”，渐渐地，这个小姑娘担当起家务劳动了。夜里她帮着丈夫磨豆腐，白天挖野菜做飯。煤火台高，她个子低，就搬个小板凳垫着做飯，摔下来，再爬上去。就在这样环境中，她的性格锻炼得坚强起来。她开始树立起这样的信念：“穷富绕不来，勤懒在自己！只要有两只手，日子再难，苦再大，也要打起精神往前过！”

就这样，郝天才这户贫农灶房上的炊烟从没有断过。哪怕是一碗野菜汤，一捧豆腐渣馍，王静仙也要做得热热火火的，应时端到丈夫和公公手里。

一九三七年，有一天忽然从川口街上来了一个伪保丁，要找郝天才家。郝天才胆小怕事，听说来了保丁，不敢出面应付。王静仙这时虽然是二十四五岁的年轻媳妇，却胆子大，主意稳，就把丈夫藏了起来，自己出面应承。

保丁到了院子里，王静仙问：“找郝天才什么事？”保丁说：“他有一两八钱银子的粮，还没完呐！”王静仙说：“我们家就没有地，哪里来的粮？”就在这时，年老有病的公公郝盛魁，在屋子里喊着说：“唉！咱有地。有十八亩地。光绪三年过年饷，一亩地五升谷子当给川口街的充保召家了。咱是有这十八亩山地。”

经老人这么一说，王静仙心里扑愣愣地象开了一朵花：“他家有地，还有十八亩地！”听说家里还有这十八亩地产业，一切希望、理想都展现在她的眼前。她想着将来只要能把这十八亩地贖回来，穷日子就有个头了。可是就在这一年，川口街

的充保召催着叫郝天才贖地。一副豆腐挑子养活大人小孩四五张嘴，哪有成宗的錢来贖地。这时有人劝他們說：“让人家加点錢把地卖成死契算了！”王靜仙却舍不得，她想着好歹有几亩地，将来日子总有个盼头。正在这时，本村的大地主楊潤三来了。楊潤三說：“你贖不起我給你贖。你就算又当在我手里好啦。”王靜仙平素也知道楊潤三在村子里是牙在外边齧着的人，专门訛騙人，可是身薄力单，出于无奈，也只好走一步說一步，挪一步近一步，让人家代贖了。成約时，王靜仙防着他耍花招，还亲自做了四盘菜請了郭得民等作中人。写契約时，她亲自磨墨，郭得民写字。写好后，王靜仙不放心，又叫郭得民念了一遍听了听，言明当价是四百二十八元，当期二年。其实，楊潤三是早設了圈套，他在代贖地时，已經把这十八亩地卖了二亩作贖价，扎根就打算訛詐郝家的地。

把地当在楊潤三手里后，王靜仙为了在两年后贖回自己的土地，起五更爬半夜，把象針尖那么一点大的時間都用上来劳动，准备贖地。丈夫平常磨两个豆腐，現在連夜磨四个，她紡花織布通夜不睡。打点玉米，舍不得吃，鎖在箱子里，自己吃豆腐渣。又喂了个猪，到腊月卖了二十八块錢。就这样省吃儉用过了二年，公公死了也沒舍得花錢，到一九四〇年，总算积攢了二百多块錢。

后半年，王靜仙就有心去贖地。可是这时村里人都說：“这地你贖不回来了！”“听說楊潤三又印了新文約！”王靜仙嘴里說：“不怕，千年文約会說話，我有管业執照。”心里却也嘀咕。她想先去探探口气，就到楊潤三家里去了。楊潤三正在場里，王靜仙說：“我想贖那地哩！”楊潤三黑丧着脸說：“不到时

候你就贖地？”“你說啥时候才到時候？”“三年！”“約上沒寫，你把文約拿出來！”“文約不是隨便看的。”楊潤三說罷，一扭臉理也不理走了。

王靜仙氣得眼都紅了。她回到家里和丈夫說了說，郝天才說：“這人不好惹，就讓他再種一年吧！”

王靜仙捏着鼻子忍氣吞聲又等了一年，看見地主家在這塊地里派長工又收又種，還收拾地邊地唇，就知道他居心不良。她看見只裝沒看見，反正到秋后再說。第二年收罷秋，王靜仙又去找楊潤三了。楊潤三正在堂屋炕上躺着吸大煙。王靜仙進到屋子里說：“我來贖那十八畝地哩，現在三年也多了。”楊潤三在炕上躺着裝聾啞，却不吭聲。王靜仙催着問他，他却暴跳如雷地說：“說的是五年！你贖什麼地！”王靜仙也火了，她說：“你把文約拿出來嘛，千年文約會說話！咱們請個人來當面看看。”“契約不是隨便看的！”王靜仙這時心一橫，把話拿出來了。她說：“楊潤三！你怀揣着刀子，我早看見了。地你霸着，只管你家吃着喝着，就不管人家死活了！咱們說理去。”楊潤三說：“隨你便！”王靜仙這時氣得難吃難咽，就去找原來的中人郭得民，郭得民這時還說了句公道話。他說：“這地恐怕你贖不走了，聽說人家把假文約都印好了。你看吧，你要到哪裡去說理，我給你說句話。”

王靜仙生長在貧農家庭，從小就在苦難生活中磨煉出了一個倔強的性格。她左思右想，這一口氣怎麼也難咽得下去，這時就打定主意去告狀。她和丈夫商量，郝天才拿不定主意，他說：“咱身薄力小，又沒護面，怕斗不過人家，還恐怕人家打你的黑槍！”王靜仙流着眼淚說：“我就是死了，也要拚上命出



王靜仙說：“楊潤三！你怀揣着刀子，我早看見了。地你霸着，只管你家吃着喝着，就不管人家死活了！咱們說理去。”

这一口气。他就是一堵墙，咱把它捅个窟窿，他也得用把泥再糊一糊。有理走遍天下，总有说理的地方！”

王静仙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去打官司的。第一次告状先到阳店伪乡公所。乡公所站岗的不让她进去，说告状得有状子。她只得东跑西跑，找人写了张状子。

第二次又到阳店伪乡公所，算是见到伪乡长赵逢泰了。王静仙还特意买了盒纸烟。可是赵逢泰嫌烟坏，睬也不睬。他只看了看状子说：“行了，明天我传杨润三来。”

第二天，天不明王静仙就来到伪乡公所门口等着。半晌时候，杨润三才来了！他愣着眼看了看王静仙，王静仙也不理他。

过头一堂，伪乡长问：“杨润三，你怎么不叫郝王氏贖地？”杨润三说：“地是我买下来的。”王静仙一听地主反了口，头蒙了一下，心里象点着了火！她问：“你买地经谁手？”杨润三说：“是郝诗书卖给我的。我有文约。”说着把假文约拿了出来。

原来这郝诗书是郝天才一个同族堂兄，在外乡流浪几十年，五六十岁时才回到村子里来。杨润三用甜言蜜语骗着他，要给他找个老婆，就让他写了张假文约，来讹诈郝天才的十八亩地。

其实那乡长已经花了杨润三的钱。他就故意问：“郝王氏，人家买的是郝诗书的死契地，你怎么诬告？”王静仙说：“他胡说！既然是他的地，怎么我来告他？他既然买了地，为什么管业执照在我手里！郝诗书根本没权卖这地！”

伪乡长这时却故意皱着眉说：“哎呀！你们这官司真古怪！我调查调查吧！”王静仙说：“这有什么古怪，理是直的，弓

是弯的。你叫他把郝詩书叫来，我們当堂对质。”伪乡长却說：“調查調查再說吧！”

头一堂問了个沒根沒梢，楊潤三更加跋扈了。他揚言說：“哼，她想贖地！她能把这块地贖走，我头朝下走三圈！”郝天才这时在家里一听說地主在堂上昧了良心，造了假文約，心里一气一急，把两只眼睛也气瞎了。王靜仙从阳店回来，一看丈夫眼睛瞎了，摸着牆在門口等她，两个人抱头大哭起来。

地主楊潤三打罢这次官司，回家后就得急病死了。可是他儿子楊滿堂比他爹更狠。在阳店过第二堂时，楊滿堂去了。他胳膊窝里夹着两条紙烟，带着几个假中人，声言要和王靜仙把官司打到底。

在堂上，楊滿堂还是一口咬定地是郝詩书卖給他家的。王靜仙叫他把原来的当契拿出来，楊滿堂却說沒有。王靜仙这时在堂上气得罵着說：“楊滿堂，你爹不作好事，短他阳寿四十年！你还想坑人害人！”可是伪乡长因为花了楊家的錢，却故意乱和稀泥不朝理上問。結果还是推着再調查調查。

从这一堂后，王靜仙往阳店又跑了一二十趟，可就是找不到伪乡长，每去一次，总是推着說沒調查清楚不見面。这时村里有人看不过，就劝她到伪县法院去告状，可是也有人劝她說：“打官司是个沒底洞，人家楊滿堂有臉面，不如算了。”

王靜仙想着：我三条大道走中間，理在我手里，难道說这普天下就沒有个論理的地方？

不久，王靜仙就到伪灵宝县法院去告状了。灵宝县离东水头三十里，还要翻沟越岭。王靜仙是头一次进县城，連东西南北也不知道，更找不着伪县政府。她沒办法，就坐在大街上

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喊冤。后来碰到一个姓謝的代书老先生，把她領到家里，問明了原委，就代她写了一张状子，并領她到伪县法院把状子从小窗洞儿递了进去。

状子递上第四天，伪法院法警来下传票了。王靜仙借了一碗白面，給他烙了三个油饅。誰知道那个法警在她家飽吃了一頓后，又跑到楊滿堂家，一住就是一夜，連吃帶抽大烟，第二天見王靜仙也不理了。王靜仙心里想着：你們这些狗！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

又等了好多天，終于算过堂了，楊滿堂这一次也被传到了。一个不死不活的伪法官在堂上問楊滿堂：“你为什么不叫人家贖地？”楊滿堂說：“地是我买的。”王靜仙接着气憤地說：“他买的地为什么沒有管业执照？”伪法官却不理她，只管問楊滿堂：“經誰手？”“郝詩书。”“你能把郝詩书叫来不能？”“能。”“下堂吧！”头一堂就是这样过去了。其实伪法院这样問一下，就是等着楊滿堂送錢。半个月后，楊滿堂把錢花足了以后，又过第二堂了。

这一次楊滿堂活动的势头很大，带着几个紳士和訟棍来到县里，他們胳膊窝里夹着紙烟，手腕上用毛巾纏着大叠鈔票。王靜仙看見只装沒看見。这一次楊滿堂把郝詩书和原中人郭得民都带来了。他用五十块銀元买通了郭得民，让他說歪嘴話；又許下郝詩书一身皮袄，让他出堂证明地是卖给楊滿堂的。

开堂审問时，又換了个伪法官。他問郝詩书：“这地是你卖给楊滿堂家的嗎？”郝詩书說：“是。”王靜仙接过来就說：“你什么时候卖给他的？你凭什么卖这地。啊，你怕死！你死了

是我埋你，还是他楊滿堂埋你？你把咱的饅往人家嘴里塞，你就知道这十八亩地贖回来我不能养活你了？！你娘死誰殮埋的？”

王靜仙这一段話把郝詩书說的低头不語，伪法官和楊滿堂都着急了，楊滿堂就让法官問中人郭得民。郭得民果然倒了口供，他說这十八亩地就是郝詩书卖给楊滿堂的。

王靜仙看着郭得民在堂上对面說瞎話，气得眼里直冒火星。她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抓住郭得民，扑通一下跪在地上說：“郭得民，当初当地的时候，我研的墨，你写的文书，写完我还叫你念了一遍，到底是卖还是当？我那天做的四盘菜是叫狗吃了！他地主有錢給你五十块，我沒錢，今天在这里給你叩个头！你今天不給我說实話，我就死在这里，咱俩都下不了堂！”

郭得民吓呆了，也确实理亏，就連忙說：“你等等，我說实話，这十八亩地是当契，沒有卖给楊滿堂家！”伪法官这时却在堂上咆哮着說：“郭得民，你咋又这样說？”王靜仙說：“哎！他不这样說你叫他怎样說？”伪法官看不可收拾，就紅着脸宣布：“下堂！”自己就先走了。王靜仙却不走，她說一定要問个水落石出。法警們却說：“到時間了，你走吧！”王靜仙无奈，只得回到家里。

王靜仙在灵宝县衙打这两堂官司时，正是风雪冷冻天气。她每天忍饥挨餓，受冷受冻，怀里还抱着个吃奶的孩子。这孩子因为尿湿的褲子在过堂时冻在脚上，把一只脚生生地冻坏，回家以后沒过几天就死了。

后来，王靜仙曾多次跑着往县里催案。有一天，忽然有个



伪法官听郭得民说了实话，在堂上咆哮着说：
“郭得民，你咋又这样说？”王静仙说：“哎！他不这样说，你叫他怎样说？”

自称是刘副官的人来調查了。他来“調查”，一来就钻在楊滿堂家里，又是吃，又是抽。吃抽个够，才来見王靜仙。王靜仙很生气，可是她还是借了五个鸡蛋給他煮着吃了。那个刘副官說：“郝王氏，我給你解释解释。我看叫他加点价，你把地就算卖給他算了。”王靜仙說：“我要卖地，村里有的是說合人，还用得着請你这外路人当中人！你来調查，不向百姓調查，却一头扎在被告家里，这叫什么調查？”那个刘副官忙說：“我这就去。”王靜仙又問：“我还等着过堂，你什么时候回县？”“今天就走。”

那个刘副官走后，又一头钻在楊滿堂家里。王靜仙留心在門口盯着，一直到月亮出来，还没有見他走出楊家大門。这一夜，王靜仙沒睡成觉，她想着这个“調查”的不用說又是叫楊滿堂买通了。就在这天夜里，叫她娘家兄弟借了个毛驴，連夜上县。到了县里，天还没明，城門还没开，她就靠在城門洞下等到天明。城門开了，进城后，她就在十字街一家飯鋪內，专等着那刘副官。

到了吃罢早飯时候，果然那个刘副官喝得醉醺醺地回城了。他一搖一摆地走着，王靜仙从飯鋪里走出来一把抓住他說：“你說你昨晚回县報告，你怎么沒回来？你住到哪家？”刘副官吓了一跳，忙說：“我昨夜到川口去有点事。”王靜仙說：“你們說是調查，去調查的什么？我問你，县里就是派你去給我說合卖地哩？走吧，咱們到法院問一下！”那个刘副官忙說：“我沒說！我沒說！”抽身跑了。

从这以后，伪法院連传問也不传了。王靜仙往县里跑了无数次，递了无数次状子，都象石沉大海。这一年八月十五，

郝天才上街赶集去了，一直到日头偏西还没回来，王静仙在家里担心，就到集上去找他。王静仙刚到村里保公所，就见里边挤了一群人，吵吵嚷嚷。王静仙进去一看，原来是地主杨满堂、郭有山等一伙人，在逼着郝天才卖管业执照。他们一群人，一个人拿着纸，一个人拿着笔，往郝天才手里塞着说：“你是家里男人，你当家，一百块钱，你把管业执照拿来。”郝天才被逼在墙角里喊着说：“我不能卖，我得和俺娃子他妈商量商量。我不能卖！”

王静仙看到这景象，气得牙关咬得直响。她闯了进去，破口大骂说：“你们真不要脸！有理的站出来！这管业执照是我的儿，谁买这管业执照谁给我当儿吧！”杨满堂这时也气势汹汹地说：“全村人谁敢不抬举我，你个婆娘家敢出口伤人糟蹋我，我要告你！”王静仙说：“正怕你不告！咱们搭着手背走。”可是杨满堂却没有去告。

自从闹了这一场以后，地主的圈套虽然没有用上，可是却在另一方面暗下毒手。杨满堂买了个保长自己当着，仗着权势百般敲诈勒索，粮款按人头摊派，没有地也得出。郝天才瞎着眼睛也得出伏顶差。就在这样残酷压迫下，王静仙被逼得害了一年多病，忍饥挨饿，把个小女孩子也饿死了。

日本鬼子投降后，一九四六年，杨满堂还是霸着那十八亩地不放手，种着吃着根本不理睬贖地这个事。王静仙这时心里想：为这十八亩地，闹得家破人亡，这一口冤气到什么时候也得出出！她又想着：你杨满堂有钱有势，我惹不过你，可陪得起你。我就是打官司打不过你，我到哪里告状，你总得跟上！不能让你这样逍遥自在。想到这里，她心一横，就到洛阳

打官司去了。

洛阳是伪地方高等法院所在地，离灵宝县有几百里。农历二月十四日，王静仙背了十二斤干粮，去洛阳打官司了。她走到村口，正碰着郝诗书在割草。郝诗书因为前二年受杨满堂愚弄欺凌，结果什么也没得到手，也转变过来，非常痛恨他。郝诗书这时感到心中有愧，他把王静仙送了十几里。郝诗书含着泪对王静仙说：“以前是我没材料，上了杨满堂的当。地是咱姓郝的，根本没卖给他。你去告吧，我替你作证。”

王静仙到了洛阳，举目无亲，找问了两天，才找着了伪法院。把状子递上后，她等了好几天，伪法院才算把杨满堂等传来过堂。

洛阳伪法庭和灵宝法院不同，王静仙看着堂上边坐的四个人，穿着宽袖子衣服，戴着墨镜子，一个个都象戏台上的奸贼，心里就有几分担心。

伪法官开始审问了。他问杨满堂：“你为什么不叫郝王氏贖地？”杨满堂说：“地是我买的，她要赖讹我！”王静仙说：“杨满堂！你是保长，你有钱有势，你说我赖你，那你有啥凭据？谁把这地卖给你？中人是誰？卖主是誰？为啥老管业执照还在我手里？”杨满堂却又拿出一张假契约说：“我也有文书，管业执照你当时说丢了没给我！”王静仙气得浑身直颤，当堂就把当地情况和打官司前后原委讲了一遍。谁知道那堂上的几个伪法官，也早花了杨满堂的钱。他们把口供记了几大张，却只是不問杨满堂。后来他们在法庭上又挤眉弄眼的鬼笑起来，把那几张口供单子，你推给我，我推给你，象拉洋片一样。

王静仙看到这情况，心象掉在冷水盆里一样！她想这几

个混账东西，哪象给老百姓问清冤枉的人！她眼里含着泪，咬着牙质问堂上说：“我这官司究竟咋样问？”堂上一个人说：“你为啥不到你们县里告？”王静仙生气地说：“我们县里的法院是吃钱卖法，不给老百姓作主！在那里我打不过他，他有钱给法官，我没钱！”

一句话说得法庭上的人红了脸，他们咕囔了一会儿才说：“今天就问到这里，你下去吧！”杨满堂一听，大着步子下堂走了。王静仙大声说：“这官司你们今天得问到底，我从几百里远跑来，你们不问到底，我死在堂上也不走！”可是那几个伪法官根本不理她，让两个法警把她架了出来。

过第二堂时，杨满堂已经回灵宝了。这家伙雇了个律师。王静仙在堂上看见一个穿着黑狐皮大衣的人，胸前挂着一个大牌子在替杨满堂说话，才知道他是律师。律师说话她也听不懂，最后只听堂上说，把这个案子判到灵宝县去问。王静仙知道他们又是推来推去，毫无指望，就咬紧牙关，头也不回地走出伪法庭。就从这一天起，她开始明白了：那个吃人的旧社会的法院，是为地主劣绅们开设的。她知道了，不管灵宝也好，洛阳也好，南京也好，到处是老鸹是一般黑。在那个社会里，钱就是“理”，“理”就是钱，有钱无理，走遍天下，有理无钱，寸步难行！

一九四七年，人民解放军打过黄河，这消息象迅雷闪电一样传遍了豫西各县和广大农村。这消息也传到地主杨满堂耳朵里，可是王静仙却还不知道。

有一天，杨满堂忽然派了张同善和戴秃子两个人来对王静仙说：“以前打官司那个事，不用再提了。不管长短，杨满堂

把十八亩地还给你家，以后保证不惹你了。”王静仙一时摸不清底细，他想着这平常杀人喝血的杨满堂，怎么会变得善良了？另外还恐怕这里边有玄虚，就坚持不要。杨满堂这时却又打发人来说合，三番五次跑着央求，并且说他可以出一张字据，这地永远归王静仙，决无反悔。

王静仙和郝天才商议，郝天才也拿不定主意。他只说：“恐怕地主不操好心。”王静仙心里想：为这十八亩地，打了几年官司，饿死冻死了两个孩子，光央人写的状子就有一大捆，也没见个结果。如今既然他低了下头，也许是他怕打官司了，就收下算了。接着就由郭家申、张同善等作证，杨满堂就把地退给王静仙家。

王静仙接过地后，已是秋末冬初。种麦子赶不上了，她就借了些扁豆种子，种成晚扁豆。每天刨刨锄锄，苗子总算出全了。她满想着这一年能收点扁豆，先还还眼。谁知道到第二年春天，解放军东移到洛阳一带，刚刚离开了陕县、灵宝，杨满堂一听说解放军走了，立即带上三个长工，套着犁耙，来犁王静仙这十八亩青苗地。

王静仙这时生了小孩还没满月，一听丈夫说杨满堂带着人来犁她的扁豆地，几乎气晕了过去。她拿起块布包上头冲出门去，在地头正遇着杨满堂。

王静仙说：“杨满堂，你为什么犁我这地？”

杨满堂怒气冲冲地说：“我的地，我想犁就犁！”

王静仙也忍不住说：“你犁人家青苗，不是割人家头吗？”

杨满堂这时却拿过鞭杆，猛地朝着王静仙劈头打过来。

王静仙被杨满堂打倒在地上，打得满身是血不会动弹。

后来，还是一些穷乡亲把她抬回了家。

王静仙回到家躺在床上，才明白过来，原来杨满堂怕的不是打官司，而是怕的共产党！怕人民解放军！从这一天起，在她的心里点燃起了真正的希望。她虽然遍体鳞伤，可是她总觉得这苦日子有个头了，天还有亮的时候。

她每天盼望着共产党到来，盼望着人民解放军迅速来解放灵宝县。果然，到了一九四八年，解放大军解放洛阳等几十个县城以后，灵宝接着也解放了。

就在这时候，杨满堂又悄悄打发几个人来对王静仙说，“地还是你家的，都是街坊邻居，以前的事千万别提了。”这一次王静仙严厉地拒绝了。她说：“我不要这地！我听说共产党爱穷人，我就等着共产党给俺分点地哩！”

灵宝县土地改革时候，杨满堂因为作恶多端，血债累累，被人民群众捉拿归案，进行公审。王静仙大娘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在诉苦会上，她指着杨满堂说：“杨满堂！你今儿也会站到这儿了！你这个被告怎不花钱活动了？今天这头上顶的天，不是你们地主恶霸的天了！你叫我死，我偏偏没死，共产党救了我。你可也有今天！”她接着把恶霸杨满堂父子讹诈她家十八亩地的过程，在会上诉了一遍，到会的群众无不切齿痛恨。杨满堂因为恶贯满盈，在广大群众要求下，当场执行枪决。

土地改革后，王静仙大娘家分了房子分了土地。她家原来的十八亩地，她要求分给各户贫农，不要分给她一家。她常说：不是为业为地，是为咱穷人那一口气。在旧社会哪有我们走的路！

村里办农业社时，王静仙大娘家积极参加了社。由于生活不断提高，心情舒畅，郝天才大伯的眼睛也治得能看见人了。现在王静仙大娘经常教育他的儿子要永远听党的话，要认真为群众办事，要严防敌人的破坏，保卫住我们人民的江山。

(李 准)

选自河南人民出版社《告状恨》

打不贏的官司

爸爸活活被人殺死

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我一輩子也忘不了這個日子。

那天一清早，我們全家都在焦急不安地等着爸爸回來。昨天晚上，村上惡霸地主郭瞎子突然把我爸爸叫了去，說是要他在夜里去看場。爸爸是個實心眼兒，沒有多想就去了。可過了整整一宿，還不見回來！

快吃早飯了，爸爸還不回來。家里人等得發慌，一個個心驚肉跳，媽就讓我去找爸爸。我雖然還只有六歲，但已開始懂事，就匆匆地出門找去了。剛走出門口，就聽人說，爸爸在看場的窩棚里，被人活活地殺死了。

這真是晴天霹靂！媽一聽，象突然掉了魂一樣，臉色煞白，兩隻手哆嗦着，身子一下子癱倒在地。鄰居把我媽摟扶到窩棚邊，她一看爸爸那血肉模糊的身體，一下就昏倒在地。有瘋病的爷爷、大伯，經這一吓，也突然清醒過來。大伯氣得口里直冒白沫，呼天喊地地哭着說：“兄弟啊，你死得慘啊！你告訴我，是誰下的毒手，我要給你報仇！”瞎子大娘們也擦着眼淚說：“是哪個斷子絕孫的向這麼個老好人下毒手！叫他不得好死！”

這時，郭瞎子和地主村長胡士杰也搖搖擺擺地來了。他



我大伯死抱着尸体不放，哭着说：“我兄弟死得不明不白，我要报官验尸，你们不许动！”

們一來，村里人都悄悄地走開了。

郭瞎子歪着脖子，那只獨眼使勁地轉着，假意勸我媽說：“別哭了，這也是命里注定的。生前沒修好德，如今落得這個慘景！人既死了，就不要再讓他暴屍露丑了，趕快入殮下葬吧！”說完，不由分說，就要叫人抬尸入殮。我大伯死抱着尸体不放，哭着說：“我兄弟死得不明不白，我要報官驗尸，你們不許動！”郭瞎子露出一臉凶相，指揮鄉警說：“把這瘋子拉開！”我大伯猛地從地上爬起來，直向去區公所的路上跑去。郭瞎子一看，趕緊叫幾個鄉警，追上我大伯，打的打，拖的拖，把他關進一間小屋，看管起來。夜里，我大伯偷着跑了出來，可是又被郭瞎子的人抓了回去。

按我們家鄉的老風俗，死人要過“接三”才能出殯。但是，第二天，郭瞎子和村長胡士杰就要把我父親下葬。我媽臥在棺材上哭得死去活來，大伯抱着棺材，聲嘶力竭地喊道：“我兄弟死得冤哪，不能就這樣含冤入土啊！……”我和姐姐弟弟們也抱着大人的腿哭着，全家亂成一團。郭瞎子和鄉警推開我媽和大伯，叫人抬起棺材就走。棺木剛入坑，我大伯懷里抱着四塊青磚趕到了墓地。他推開旁人，把青磚壓在棺蓋上，然後跪在靈前哭着說：“好兄弟呀，我一定給你報仇！有朝一日，你的仇報了，再拿掉青磚，讓你翻個身，重見天日！”

就這樣，我爸爸不明不白地死了，又被郭瞎子催着匆匆忙忙地埋了。究竟是誰把爸爸殺了？究竟為什麼要殺死我爸爸？我當時還小，還不懂得。但那天爸爸死的情景，我一直記在心里。

原来郭瞎子是凶手

父亲一死，留下大小五口人，妈妈，我，十一岁的姐姐，还有一个五岁、一个三岁的两个弟弟。妈妈把悲痛和仇恨埋在心里，带着我们姐弟几人苦熬日子。全家没明没夜，累断了筋骨也塞不饱肚子，两个弟弟都先后饿死了。没有办法，我就去给富农陈志清家扛小活，还是混不下去。后来，我十二岁那年，又离开家到天津去当学徒。临走的前一天，妈妈哭了一整夜。她看到刘家只剩下我这一条根儿，实在舍不得放我走。该起身了，妈摸着我的头哽咽着说：“孩子，去吧，到外面闯闯，长点见识，学点本领，回来好……”我实在憋不住了，可又不敢哭出来，怕惹妈妈伤心，就什么也没说，挣开了妈妈，一直走了出去。

到了天津，一跨进工厂的大门，我就后悔起来。唉！这哪里是工厂，简直是活地狱。好多小伙伴，个个面黄肌瘦。监工象个瘟神，拿着三尺长的粗木棍来回游荡，看谁不顺眼，当头就是一棒。在厂里干了一个月，就把我折磨病了。我被送到了“病号间”，那里屎尿满地，臭气冲天。一天只给两顿饭吃，一顿一碗稀粥。我的病越来越重，老板看着从我身上榨不出油水来，就把我赶了出去。回到家里，躺了半个月，病慢慢好了，就再去扛活。

父亲是谁害死的，妈妈从来也没有对我说过。我年岁渐渐大了，风言风语地听说父亲是叫郭瞎子杀死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却弄不明白。去问乡亲，谁也不敢说。问我妈吧，怕提起这事惹她难过。郭瞎子家就在我家邻近。一天，他和他叔

叔不知为什么吵起架来，越吵越凶，后来他叔叔就破口大骂道：“媽的，你怎么富的？我还不知道，你不就是害死了那个姓刘的，霸占了人家的产业才富的！”这回我再也忍不住了，就回去问我媽：“父亲是叫郭瞎子杀死的不是？”媽一听，突然間，全身颤抖，眼发直，腿发軟，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我吓得赶快抱住了她。过了半晌，媽才流着眼泪慢慢地把事情的原委給我訴說了一遍。

原来我爸爸就是被这个恶霸郭瞎子害死的。

爸爸被叫去看場的那天晚上，正是个月黑天，伸手不見五指。爸爸在窩棚里，郭瞎子也来了，而且对爸爸特別亲热、和气，跟我爸爸拉这个，扯那个，还非得叫我爸爸唱戏湊熱鬧。爸爸在白天劳累了一整天，晚上又被这样折腾了半夜，实在困极了，一倒下去就呼呼地睡着了。正在我爸熟睡的时候，郭瞎子就悄悄拔出早就准备好了的尖刀，狠狠地向我爸爸的头上扎去……。

我爸就这样死了。郭瞎子以为自己做事机密，神不知，鬼不觉。誰知道沒有不透风的墙，郭瞎子杀死我爸的时候，叫另一个看場的乡邻看在眼里，人家明里不敢直說，可暗里就慢慢传开了。終于也传到了我媽的耳里。我媽又哭得死去活来，但天下是人家郭瞎子的，誰敢伸冤。媽就这样含冤忍辱地生活了下来。一提起这些，媽媽就悲痛地止不住流泪，她憤恨地說：“这些年媽带着你們可真不容易啊！郭瞎子总想逼走我，可我就是不走，再艰难也要把你拉扯大，好給你父亲报仇！”我听了媽的話，气得咬牙切齿，恨不得馬上就去和郭瞎子拚了。媽又拉着我說：“孩子，你年岁还小，現在还不到报仇的时候。

郭瞎子可是啥事都干得出来的，到外面你千万不要讲这事，免得他再对你下毒手。你要长点心眼，不要莽撞，过几年，你长大了，再同他算账！”

为了夺我家的田产

恶霸地主郭瞎子为啥下毒手害死我爸爸？这个狼心狗肺的家伙，原来是为了吞没爸爸和伯伯的田地家产。

本来，我们老家不是在这大兴津营村。早辈子老家在河北景州，到清朝咸丰年间，景州闹饥荒，才逃到这里来。经过几代人的扛活打短、省吃俭用、流血流汗的劳动，到我爷爷这一代，才好不容易置了些田地。可这就引起了村上恶霸郭永海的眼红，一心想霸占这些田地。

我爷爷、奶奶和大伯，不幸都得了疯病，到一九一五年，我的二爷爷又死了，只留下我二奶奶和一个闺女。这时候支撑门户的，就只剩下我父亲一个人了。郭永海看我家老的老，小的小，死的死，疯的疯，以为时机已到，就更加处心积虑地想吞占我家田产。他先从我二爷爷那里下手，然后再来动我爸爸十五亩地的脑筋。提起这个郭永海，真叫人恨得咬牙切齿。他是村里有名的一霸，又是村公所里的一个什么头儿，和地主村长胡士杰有勾结。胡士杰叫乡亲们出钱给郭永海哥三个每人买了一枝枪，名义上是叫他们巡夜护村，实际上是给自己当打手。郭永海整天提着盒子枪在街上乱窜，到了谁家，谁就得倒霉，谁得罪了他，就对谁下毒手，真是图财害命，烧杀奸淫，无恶不做。他是个独眼龙，一使坏心眼，就歪着脖子使劲挤那只瞎眼，挤得嘴都歪起来，乡亲们背地里都叫他

“郭瞎子”。邻村有个老实巴交的人，见了面不会奉承他，他怀恨在心，就放火烧了人家的秫秸。他想霸占一个贫农的孀子，就叫人把那个贫农叫到他家里，黑丧着脸说：“我给你说明了，从今儿个起，你孀子就跟我过了，你有啥说的没有？”在那个时候，贫农敢说什么呢！他还在村南开了一个黑店，经常搶劫过路行人的钱财。他看到过路人带的财物多，就随便找个词儿，不是枪崩，就是活埋，好把人家的财物弄到他手里。有一天，一个过路人穿着皮袄，带了不少东西，他就说人家是土匪，到夜里枪崩了那个人，东西全归他自己，连衣服都给人家扒了。

我二爷爷一死，郭瞎子就下手吞占他的家产。那年，我二奶奶的闺女正要出嫁，为买嫁妆借了郭瞎子家几块钱。没想到，这几块钱就成了郭瞎子要我们命的索子。郭瞎子用利上加利的办法，连骗带逼硬要我二奶奶典给他十八亩地。字据上明明写的是典十八亩地，郭瞎子却连拐带骗，占去了整整三十亩地。地主村长胡士杰也出来帮郭瞎子的忙，因为二奶奶的房紧挨着胡士杰家，他也想趁机吞占我二奶奶的房子，所以两个人合起来打鬼主意。

一不做，二不休，郭瞎子夺了我二奶奶的田，还想杀了我爸爸，再逼我媽改嫁，这样，就不怕我爸报仇，还可以霸占我家的田地产业。

吞了我二奶奶家田的第二年，郭瞎子在那三十亩地上收了二十多袋芝麻，真是得意洋洋。可我家少了三十亩地，日子实在没法过，我爸气得跺脚说：“甭叫他美！秋后我就是卖了孩子也要贖回那三十亩地！”这话叫郭瞎子听见了，心里着实

不安心，他把盒子枪啪的往桌上一摔，說：“哼！說的倒容易，要贖地，先摸摸你脖子上长了几个脑袋，生了几条筋！”就为了这，郭瞎子起了杀人的歹心，向我爸爸下了毒手。

打官司也沒穷人的理

一九三五年，我二十五岁。心里埋了二十年的仇和恨，再也压不下去了。

这年我二奶奶死了，郭瞎子又生了歹心。他硬强迫我把二奶奶的养子赶走。我看透了郭瞎子的黑心，他是想叫我赶走了二奶奶的养子，絕了后，然后再霸占我二奶奶的全部家产。我坚决不答应，同他吵了起来。他那个凶样子把我媽气坏了，就說：“郭瞎子，你害死了他爸爸，还想再害死他！”这一来，郭瞎子恼羞成怒，歪着脖子，挤着那只瞎眼，一蹦老高地說：“我就是要害，我全要害！”旧恨新仇，实在无法再忍，埋在心里二十年的怒火爆发了。我拍着桌子說：“郭瞎子，你的心腸也太狠毒了，你杀死了我父亲，霸占了我二奶奶的地，还不死心，还想把我二奶奶这个門儿給灭了。告訴你，我刘宝善可不是好欺負的……”我痛痛快快罵了他一頓，把他为非作歹、图财害命、杀死我父亲的事情全都揭了出来。

仇恨的閘門一經打开，就再也沒法关闭，我到区公所告下了郭瞎子。这时胡少敬已接替他爸爸胡士杰当了村长，他和区上一說，就把这个案子給压下了。你压下了案子，可压不下我这股恨气，我要另找說理的地方。一咬牙，我把仅有的十五亩地卖了十亩，又到北平市地方法院告了状。

郭瞎子見我真的鬧了起来，做賊心虛，就和胡少敬商量，

想让我贖回那十八亩地，好叫我不声不响，就此作罢。他連騙帶吓地对我說：“贖回地，不准再提你爸爸的事；要不，就把你送官治罪！”好毒辣的手段！杀了人，还想堵住人家的嘴！呸，沒那么便宜的事，郭瞎子的算盘打錯了！我决心把官司打到底。

状子递上去十几天，沒有半点消息。我又去催了几次，法院才过了堂。法官先向我們扫了一眼，然后慢吞吞地問道：“被告郭永海，刘宝善的爸爸是你杀死的嗎？”郭瞎子馬上向前走了一步，躬着腰，滿面带笑，恭恭敬敬地說：“嘿嘿，法官先生，这事从哪里說起呢？他沒根沒据，张口咬人，我怎么會杀死他爸爸！”法官又叫我說。我就把事情源源本本說了个一清二楚。最后，我对郭瞎子說：“你杀死我父亲的事，村里誰不知道！你們叔侄吵架都抖了出来，这还能賴掉！我問你，要不是你杀的，你为什么不准报官驗尸，不过接三，就强迫把尸体下葬入土？”郭瞎子干咳了几声，支支吾吾地說：“那，那都是村长胡士杰的主意。”法官要传胡士杰，郭瞎子急忙湊上去說：“胡士杰死了。”这家伙竟敢青天白日在大堂上說瞎話，气得我大声說：“你胡說，胡士杰沒死。”可是沒有等我說完，法官就搖响了鈴鐺，打斷了我的話，宣布“案情不明，尙待調查”，夾着皮包走了。我狠狠地跺了跺脚，离开了法庭。心里說，你們想怎么調查就怎么調查，反正你不能把真的調查成假的。

回到村里，我直奔胡士杰家。見面就問他：“你知道不知道我父亲是叫人杀死的？你当了几十年村长，知不知道被杀死的人要报官驗尸！为什么沒驗尸你就叫郭瞎子把人埋了？”

胡士杰說不出理，只得推說那是郭瞎子的主意。我說：“你們不要推來推去，這筆賬非算清不可！”

郭瞎子怕有人給我作證，就放出話說：“各人的事各人當，誰敢出來管閑事，哼！我叫他瞧好看的。”他又向法院的上上下下使了許多錢，胡少敬還幫助他請了個律師。我想，你有錢買律師，我去用理說律師。一天，我找到了郭瞎子的律師，對他說：“先生，您是幫人打官司的，您的心眼兒一定公正，應當給有仇的人報仇，給有冤的人伸冤。我含冤二十年了，請您給我說句公道話吧。”律師對我眨了眨眼，慢條斯理地說：“我是郭永海請的律師，花了他的錢怎么能替你說話呢？”儘管律師這樣說，可我仍然沒有泄氣，總想着有理講倒人，你們再有錢也不能把這“理”買去吧！以後，又過了幾次單堂，問了些無關緊要的事。打官司要花錢，幾口人要吃飯，十畝地的地價花完了，官司仍然沒個結果，真急死人了。

又等了一個多月，才接到法院的通知，叫我第二天去聽判決。那天夜里，我翻過來，滾過去，就是睡不着。是黑是白，就看明天了！一想到郭瞎子、胡少敬有錢有勢和那律師的話，我的心就涼了。我心想，難道我父親的仇就報不了？這十畝地就白貼進去了？又一想，不會吧！常言說“人命關天”，別的事情能胡來，這人命官司總不能胡來吧！再說，又是北平市的法院，不會那麼不講理。這樣一想，我又相信官司會打贏。

天麻麻亮，我再也躺不住了，爬起來就向法院走去。法院的大門還沒有開，我就在門外等着。後來大門開了，但過堂的時間還不到。這天，時間過得好象特別慢。我坐得不耐煩，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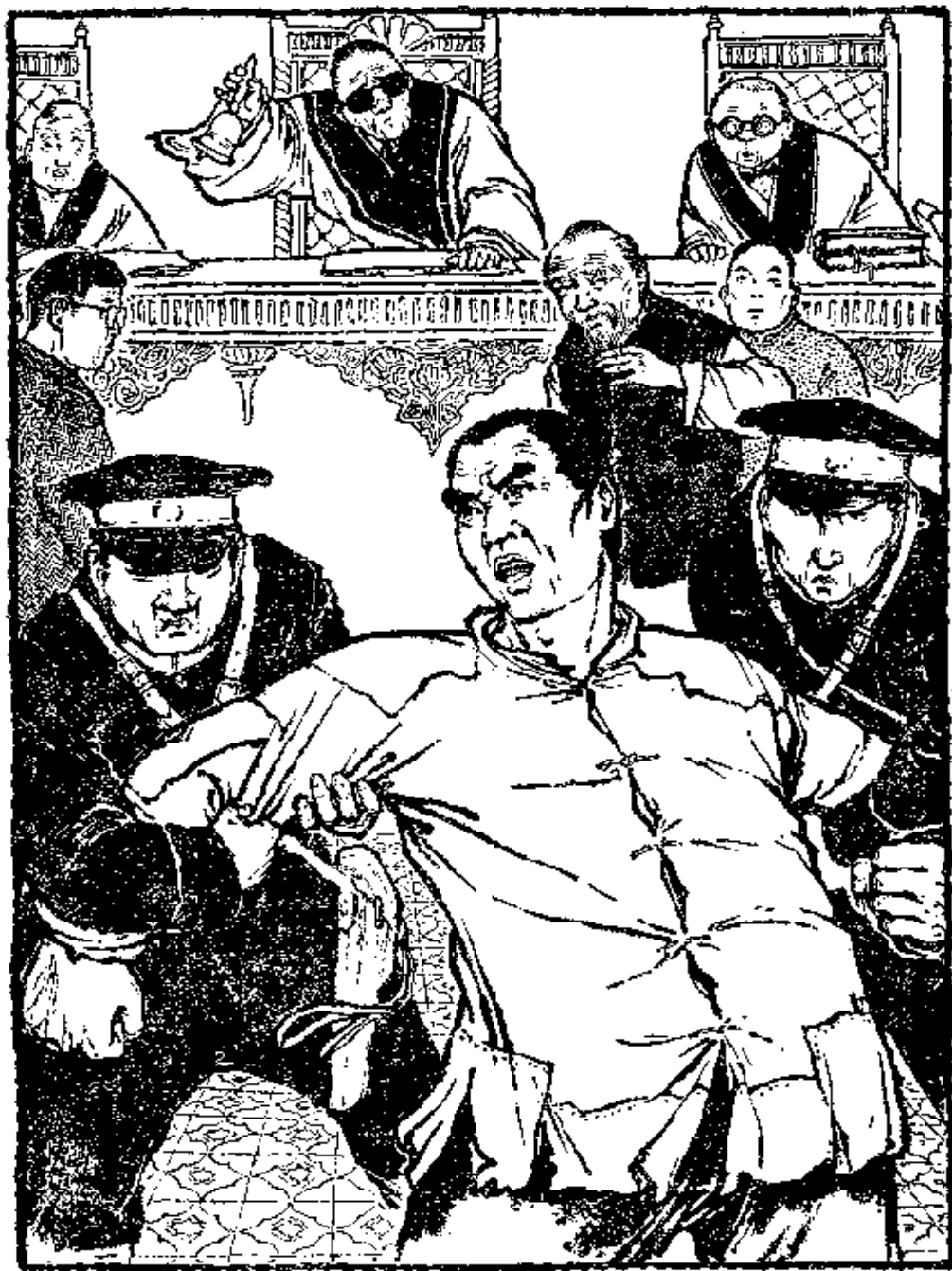
起来走一会，走得不耐烦，又坐下来，立坐都不是滋味。直到快过堂了，郭瞎子、胡少敬同他们的律师，才晃晃悠悠地进来了，脸上的神气得意洋洋，一点都不带打官司的样子。我心想，看样子糟了。

过堂时，法官的问话和郭瞎子答的同上次差不多。然后，胡少敬和那个律师又替郭瞎子狡辩了一通。我正要说话，法官就站了起来，宣布判决。我一听念到“郭家无罪”，脑袋就嗡嗡直响，眼前金星四起，一切东西都转了起来，想要说话，可就是说不出来，迷迷糊糊地被人搀出了法院。

就这样算完了吗？二十年的冤仇就这样石沉大海？不，不能！不出这口气，我死了也合不上眼。听说北平还有个高等法院，我想也许那里好一点，就又求人写了一张状子递到北平市高等法院。状子递上去，一连两个月没有一点音信。这期间只见郭、胡两家的人，不断往城里跑，也不知他们搞的什么鬼。好容易盼到了过堂，没有问多久，就宣布判决，说的同地方法院一样。这一回，可把我给气炸了，不由地高声问道：“你们调查了没有？官司怎能这样问？这叫什么法院？……”话还没讲完，法官赶忙叫人强把我架了出来。

出了法院大门，我就放声痛哭了一场。打了一年官司，二十年的仇没有报，反而越结越深了，不只是郭瞎子，又添上了地主村长胡少敬。我慢慢明白，原来这世道儿就是不讲理，村长、区公所、北平市地方法院，直到高等法院，全是一路货。他们和有錢人站在一边，专给有錢人办事，专会收拾穷人。他们认的不是理，而是那个能使鬼推磨的“钱”！

没有讲理的地方就不报仇了吗？不！我不甘心！我总想



我不由地高声問道：“你們調查了沒有？官司怎能
这样問？這叫什么法院？……”話還沒講完，法官趕忙
叫人強把我架了出來。

找个别的办法。想来想去，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最后就想先忍住这口气，好好孝顺老母亲，照看小孩子，把母亲送了终，孩子长大了，叫他们到远处找自己的活路。然后，我就和仇人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血拚一场！

活着受罪，死不甘心

官司输了，还背了一身的债，怎么过日子呢？去扛活吧，工钱还不够还利息。租地种吧，必须先交出一年的租。没有办法，把最后的五亩地也典了出去，才租种了一家富农的二十五亩地。我想只要咱肯下力好好种它几年，也许能有活路。谁知祸不单行，那一年偏偏又碰上大水灾，平地涨水半人深，庄稼全淹死了，一颗粮食也没有收。借钱吧，没有东西抵押，谁也不肯借。眼看一家大小就要饿死，身后还跟着要债的催命鬼。我越想道儿越窄，又急又气，一下子就病倒了。

仗着身子骨结实，家里人又不断给我说宽心话，病慢慢好起来了。我把母亲和媳妇叫过来一起商量条活路。商量了半天，都想不出法子。留在家里是等死，我和媳妇出去找活路吧，又不能把小孩留给母亲。想不出活路，我的气又上来了。我大声喊着：“大人都保不住，还要孩子做什么？”母亲一看我急了，就哭着说：“你和媳妇出去找活路吧，孩子留给我，你们别管。”母亲这么一说，全家都止不住大哭起来。最后我们决定，我和媳妇、十二岁的大孩子到北京找活做，母亲和我的闺女、二小子留在家里。一个和我一起扛活的穷兄弟，听说我们要去北京，给我送来了一块钱。他拉着我的手说：“托人找事也要花钱，把这个拿去吧！”

那年头，一分别也许再也见不着面了。家里剩了一老两小，日子可怎么过？大家心里都感到很难过，越是要分别就越不愿意提起分别的事，直到要走的那天，家里还好像没有一点事儿一样。可是孩子不象大人，临走时，三个孩子，留下的舍不得离开妈妈，要走的舍不得离开奶奶，都抱着大人的腿哭起来。孩子妈含着眼泪哽咽着说：“孩子，好好跟奶奶在家，妈挣钱去，挣了钱给你们买……买好吃的……”孩子哭着说：“我要妈，不要好吃的。”全家老小抱在一起，又是一场痛哭。

一九三八年冬天，我们到了北京。这时候，北京已经叫日本鬼子占了，秩序很乱，找事儿很不容易。我把媳妇领到佣工介绍所，给人家说好话，送礼物，才找到了事儿，去给人家当老妈子。又托人送大儿子去皮鞋庄学徒，我去洋车厂拉洋车。就这样，一家六口，分散到四个地方。

那时候，拉洋车也不是人干的活。穷人多，富人少，拉车的多，坐车的少，一天挣的钱除了交车租、店费就剩不了几个。碰到风雪天更难过，不出车吧，一天的伙食没有着落，出车吧，往往挣的不够交车租，拉不上座儿很发愁，一拉上座儿可就得上命地飞跑。有钱人坐在车上呼三吆四地喊“快跑！”有的还用文明棍敲你的脊梁。最可恨的是日本鬼子，他们简直不把车夫当人看待，常常故意作弄人，越是看到你快累死了，越嚷“快快的！”“快快的！”等车夫一个跟头栽到地上，再也起不来了，他却乐呵呵地下车就走。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我不知看到了多少回！我不愿意拉日本鬼子，总是躲着他们，可有时叫他们喊住了，也没有办法。有一回，我拉了个日本鬼子，到了地

方，一說要錢，他瞪着狗眼，劈里叭啦地打了我几个耳光，打得我朝后退了几步，他却揚長而去。我常想，有錢人是人，窮人也是人，为啥拉着他們还得受他們的氣？

快十一月了，有錢人都穿起了皮袍，有的洋車夫却只能到店里要几张破報紙，撕成条条，从脚脖一层一层地纏到大腿根，再披上两条破麻袋，来抵擋那刺骨的西北風。晚上，就到飯鋪里討些熱水，裝在煮飯的沙鍋里，攬在怀里，暖暖心窩。賣烙餅的小販，在街上砌有磚爐子，夜里火灭了，爐膛里可还有点熱氣，交不起店費的洋車夫，就縮着身子靠着磚爐子熬過漫長的冬夜。

我的病本來就沒有好利落，現在吃不飽，又勞累，加上看不慣這世道，受不了有錢人的氣，拉了一個多月洋車，又病倒了。正在這時，聽說我大伯叫日本鬼子打死了。又惦念家里的老小，怕惡霸地主再對他們下毒手，我就決心回家去。

北京離我家只有七八十里路，平時回家不算什麼，六七个鐘頭就到了。這回因為有病，渾身酸疼，一根根骨頭好像全酥了，動一下，就象針扎一樣。腳上也象套上了千斤鐵鏈，抬一抬腿都很艱難。我找了根棍子拄着，咬緊牙關，一會一歇，慢慢地往前挪。天黑了，還有二十多里路。這時，我的腦袋簡直成了空的，嗡嗡直响，心里噁心得要命，老想吐，可又吐不出來，眼一黑，就昏倒了……。

當我清醒過來時，全身都凍僵了。胳膊腿都不聽使喚，費了好大勁，才站起來，可剛站起來又摔倒了。歇一會，再站起來，還沒站穩，又摔倒了。摔了几回，就再也站不起來了。棍子也不知摔到哪儿去了，我哆嗦着把手伸出去，在硬梆梆的地

上摸了好久，也沒有摸着。抬头望天，一个星星也沒有，向前一看，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见，只有那西北风呼呼地刮着，刮得我的脸象刀割一样疼。我躺在地上，又想到二十多年的冤仇，想到三次告状的前前后后，眼泪就象断了线的珠子，直往下流。看来，我刘宝善今天非死在这路上不可了！迷迷糊糊，忽然我好像看到爸爸那血肉模糊的尸体，看到了郭瞎子那副杀人的凶相。不，我不能死，我不信天下老是有钱人的，我不信穷人就沒有出头的日子，我要看看这世道到底变不变！不能走，我就爬！我挣扎着坐起来，把手放到嘴上呵气，手稍微能活动了，我就脱下脚上的两只破靴头，套在两只手上，用两只手和两个膝盖，撑着身子朝前爬。我不敢回家，怕妈妈看到我这个样子伤心，就向我姐姐家爬去。爬到我姐姐家门口时，已经半夜了。我不愿叫姐姐看到我是爬回来的。又休息了一会，慢慢把破靴头穿在脚上，使劲扶着门框，颤颤抖抖地站起来，找了块砖头，使劲地砸门。门开了，把姐姐吓了一跳，我想喊一声“姐姐”，但喉咙好象被什么塞住了。等姐姐认出是我时，什么都明白了，啥也沒有问，就一边擦泪，一边同姐夫把我架进屋去。

我惦记着妈妈和孩子，第二天，一定要回家。姐夫留不住我，就借了个毛驴，把我驮到家里。可怜的孩子，看见我回来了，还真以为我挣了不少钱，直向我要好吃的，我妈赶快瞪了他们一眼，孩子才不说话了。

这是我们家最艰难的时候，我病在家里，媳妇一月才挣一块钱，哪里能顾住五口人。家里可真是米光面净揭不开锅了。难道說就没有个日子过得去的亲戚？有，我舅家就是个地主，

既是至亲，又有的是錢。可是，有錢人只认錢，不认亲，虽说我表哥是我媽抱大的，可是，我父亲死后二十多年，他們从来没有跨过我們家的門槛。穷死我都不巴結有錢人，你不来，我也不往，这門亲戚就断了。真正帮了我的忙的倒是穷亲戚和穷哥儿們。我姐夫是个长年扛活的，不断来我們家，来时沒多有少，沒好有坏，总要給我們拿点东西。我扛活时的穷哥儿們也常来看我。他們沒有东西拿，就来和我說說話儿，寬寬我的心。

年关到了，有錢人杀猪宰羊，磨面蒸糕，喜气洋洋。可我們家盛米面的家伙照旧是光当光当响。大年初一，孩子們纏着奶奶要吃餃子，哪来的白面啊！媽用紅高粱面掺榆皮面和在一起，湊合着包了一頓餃子，还哄着孩子們說：“紅餃子好，紅餃子吉利。”孩子們餓了几天，哪管紅面白面，高粱面餃子吃得也滿香，还一边吃一边說着：“紅餃子吉利，紅餃子吉利。”我和媽媽可背着孩子，擦起了眼泪。

媽媽苦心照料了二十多天，我的病才慢慢好了，病稍好，我就又去扛活。又过了两年，大儿子受不了掌柜的打罵，跑了回来，媳妇干活的那家不用人了，她也回到家里。我們一边想法糊口，一边还要提防着恶霸地主。我知道，打官司之后，他們更恨我了。扛长活，活主固定，他們容易摸我的底，我就給人打短，今天这家，明天那家，叫他找不着我。每天天黑以前我就赶到家里，防备他們路上暗算。怀里还經常揣把刀子，恶霸地主要收拾我，我就得先在他头上穿个窟窿。我把窗子用磚堵起来，只在上面留几道縫儿。天一黑，就把大門上得結結实实。我还借了一把义和团用的三尺长的大刀，把它磨得雪

亮，放在床头。

旧社会就这样把我害得无处藏身，活又活不成，死又死不得。正当这些恶霸、地主、官僚、老板把我逼得走投无路时，我听说什么地方出了共产党、八路军，专门斗地主，帮穷人，我心里突然一亮，盼望着共产党、八路军赶快来搭救咱穷人，来变变世道！

共产党替我报了仇

没等着我报仇雪恨，郭瞎子就死了。村里人都拍手称快，可我们穷人仍旧翻不了身，仍旧是吃不饱、受欺负，世道没有变。胡少敬还是当村长，什么事还是有钱人说了算。我家里还是饿一顿饥一顿，过着苦日子。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救星共产党。那是一九四四年，正是抗日胜利前夕，我们村里来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队。他们晚上出来活动，给我们穷人讲打倒日本鬼子、穷人闹翻身的道理。他们还把我们村里一个当汉奸、作恶多端的地主拉出去枪毙了。在这当儿，地主、恶霸也不敢那么凶了，有的还溜走了。共产党说的和做的，全合我的心意，我一心向着党。我认定了他们是为穷人办事的，就把我的冤仇全告诉了他们，他们说一定要为我们穷人报仇。又告诉我，压在穷人头上的不只是一个两个恶霸、地主，而是整个旧制度、旧世道，受苦受难的也不只是几个穷人，而是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这算让我开了窍了，我忙着为他们做这做那，挖地道，送情报，我活着也算有个奔头了。

抗战胜利后，心想着世道要大变，不料蒋介石这反动头子

又集中兵力打共产党、八路军。在我们村里的共产党工作队也转移到东北去了。这以后，胡少敬这班人又凶了起来，照样欺压穷人，骑在人民头上。但不管怎样，我也有了指望，心里想，看你还能凶几天！共产党回来再和你们算总账！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的一天早晨，我正在屋里吃饭，突然听到几声枪响，我赶忙放下碗，去拿我的大刀。正在这时，又听见大门口有人喊：“大爷！大爷！”我一听喊大爷，心里一楞。回头一看，门口站着一个人穿粗布军装的人，他亲切地对我说：“大爷！不要怕，我是解放军，是共产党的队伍，专打地主恶霸。”“解放军？专打地主恶霸？”我念叨着这几个字，心里一热，眼泪就止不住流了下来。到底又把共产党的军队盼来了。

北京解放后，村里来了工作队，建立了人民政权，成立了农会。乡亲们选我当农会主任。这一回可真是咱穷人当家了。工作队帮助我们搞土改，闹翻身，分了胡少敬和别的地主的土地。我领着大伙，冲到胡少敬家，叫他交出了地契和埋藏的东西。还把胡少敬管制起来，只准他老老实实，不准他乱说乱动。我经常到区里、县里开会，和区长、县长一起念叨国家大事。以前的衙门是地主恶霸的靠山，现在的人民政权成了为咱穷人办事的机关。

党还不断开导和教育我们穷哥们，使我逐渐提高了觉悟，认识到我的仇人不只是郭瞎子、胡少敬和那些不讲理的法院，而是整个地主阶级。郭瞎子、胡少敬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势力，敢那么欺负我？就是因为他们有整个地主阶级和他们的法院、军队、国民党政权作靠山。在旧社会，受苦的也不只是

我刘宝善一个，广大贫下中农的命运都是一样。以前我想靠个人血拼一场，那不管用，必须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团结起来闹革命，打倒所有的阶级敌人，才能彻底翻身。

明白了这些道理后，我就更积极了。毛主席号召走社会主义道路，我坚决拥护。一九五一年，我就和几户贫农组织了河津营的头一个互助组。一九五三年，我又组织了第一个合作社，当时只有十八户，第二年就变成五十户。我们的社办得好，还受到区里的表扬。一九五五年快秋收时，少数上中农鼓动大家闹退社，新入社的几十户，受了欺骗，都退了出来。拉牲口，要大车，乱成一团。上级党对我说一定要保住合作社，我就坚决向闹退社的上中农作斗争，又去说服受骗的贫下中农社员。经过这场斗争，要退社的人都回来了。秋收后，社里又是大丰收，没有入社的人都争着要入社，连外村的人都来申请入我们的社，社员一下子增加到八十户！后来，组织高级社、联村社、人民公社，哪一次我都站在前头，还一直当干部，为大伙办事。越走我越觉得毛主席指的道儿对。现在我们贫下中农不只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也翻了身。我们村修了大水渠，引河水浇地，架起了高压电线，装了水泵，抽水灌田。还安了电磨，有了电灯，牲口、农具也都齐全。集体经济年年发展，社员生活步步提高。这两年更好了，粮食增产，一年平均每户还能分到百十元钱。我的大闺女、二闺女都已出嫁了，两个儿子，都早已结了婚，现在都已有了孩子，还有一个小闺女，加上我妈和我们老夫妻俩，一家人和和睦睦地住在一起，有的劳动，有的念书。我妈七十七岁了，她常说，“这世道太好了，可惜我的眼睛瞎了，不能亲眼看看这好世道。”去年我家

盖了新磚房，我搀着媽媽在院里走了一圈，孙子孙媳們也都跟在奶奶后边，把新房的样子詳詳細細地給她說了一遍。她也到处摸一摸，問一問，高兴得直說：“托咱毛主席的福，托咱毛主席的福呀！”

日子越过越痛快，我也越活越年輕。現在貧下中农弟兄又选我当貧农协会主任，我是共产党员，那沒有說的，一定好好为咱貧下中农办事，永远跟咱毛主席走，搞好集体經濟，把革命进行到底！

刘宝善 口述

齐化 整理

选自北京人民出版社《前仆后继創江山》

五亩麦子

我的老家在四川省万县。在旧社会，我们家几辈子都给地主扛长活。曾祖父和祖父是累死的。奶奶是饿着肚子在山坡上给地主种地，晕倒滚下坡来摔死的。爹从能甩动鞭子起就给地主放牛。后来因为生活困难，全家就逃荒到忠县。

在忠县的时候，我家有八口人，爹和大哥在地主家扛长活，二哥给地主放牛，三个人一天到晚拼死拼活地干，还填不饱一家人的肚子。到一九四一年的时候，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爹只好又带着我们全家，挑着个破挑子，一头是几件锄头烂农具，一头是破锅烂碗，从忠县逃到了梁山县香炉寨。

香炉寨有个地主保长，外号叫杨扒皮，他看爹和哥哥身体壮实，是两个种庄稼好手，在我们逃到香炉寨的第二天，他就来找爹说：“石老汉，别逃了，我租给你几亩好地，借给你间房子，庄户人家，有地种，有住的，这家就安下了，东跑西颠的几时算完啊！”

爹一想也对，就留下了，住在杨扒皮的牛棚里。

第二天，杨扒皮领着爹去看地，到了村东边的荒草滩上，他用手一指说：“这就是，你挑一片吧！”

爹一见这地惊住了。这哪是地呀！石头蛋蛋成堆，野草乱蒿子长的有半人高，怎么种啊！爹犯难了。杨扒皮见爹望

着草滩不出声，便凑近一步笑咪咪地说：“这地石头多点，不好种，这样吧，头两年我不收你的租子。”

爹回头问大哥：“种不种？”

大哥是个牛性子，他憋声憋气地说：“种！只要有土，咱就能让它长出庄稼来！”

从这以后，妈妈每天领着咱们几个小的出去讨饭，爹就领着大哥和二哥到荒草滩上去拾掇地。

这块地原来是杨扒皮放猪放牛的地方，他早就想把它开出来。可是村子里的佃户都知道这是块兔子不屙屎的地方，没个愿种的；叫自家长工开，又舍不得本钱，这才让我们来种。

整整半年的时间，爹和两个哥哥每天起五更爬半夜到荒草滩上，一刀一刀地砍倒野草乱蒿子，一块一块地拣走碎石头，一镢头一镢头把地刨得宜宜的。地太瘠薄，三个人就翻过一道山梁，到三里外的河湾里，一背箩一背箩地背来河泥上到地里。“人勤地不懒”，经过爹和两个哥哥精心垦种，这块兔子不屙屎的荒草滩，竟变得象块地的样子了。

爹在这块地里种上了麦子。麦子长的很好，麦秸又粗又壮，能漫人腰。过路的人看见这麦子都要停下来看上一看，夸上一夸。咱们全家人看见麦子这样好，都喜的了不得，觉得生活有了盼头。爹还说，等到麦子收了以后，给大哥娶媳妇。

麦子快收了。自从我家种了荒草滩的五亩地后一直没露面的杨扒皮，这几天也常在这块地边上转，不住嘴地夸麦子长的好，他常常跟爹打着哈哈说：“石老汉，我杨玉山没亏待你吧，这麦子长的多好！”

“谁受苦谁知道！”爹受的苦没法说，只得用好听的话应

酬他。

楊扒皮越夸，爹心里就越不安。誰知道楊扒皮肚子里怀的是什麼鬼胎呢？大哥不在乎地說：“管他呢！讲好两年不交租子，麦子长的再好，他还不是鼻子尖上抹香油——聞得香吃不着。”

一天，吃过早飯，爹到了麦地，見麦子叫牲畜吃了一片。再往里看，六条大水牛正在左一口右一口地吃着麦子呢。爹气的跑上去，一看这水牛是楊扒皮的。爹把牛轰了出去，找到了牛倌，牛倌說是东家让他往地里放的。爹一听这话气坏了，可是楊扒皮是东家，不敢惹他，只得忍气吞声，牵着牛去求楊扒皮：“东家，麦子快收了，今天牛把麦子吃了一片，我求求你，往后让牛倌把牛赶远一点放……”

爹的话还没說完，楊扒皮就搶着說：“石老汉，那片荒草滩几辈子就是我家放牛的地方，不能因为你种了点麦子，就改了我放牛的規矩，把牛餓死啊！”

爹一听这话，知道他是成心找别扭，可是“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地是人家的，有什么办法。只得苦苦哀求他，說了半天楊扒皮才不耐烦地說：“好了，好了，我跟小牛倌說一声，让他把牛看好就是了！”

第二天楊扒皮的六条水牛照样到我們家地里来吃麦子。轰走了，又回来。爹气得渾身直哆嗦，看着一家人一滴血一滴汗种出来的麦子，让牲口糟踏着，心疼的象刀剜的一样。大哥眼睛都气紅了，他猛地摸起把鐮头朝着牛跑了去。到了牛跟前，他一边罵着，一边抡起鐮头朝一头大花牛的屁股就砍了去；大花牛見人来撵它，甩着尾巴就往前跑，鐮头下去沒砍实，



大哥气愤地说：“我知道这是楊扒皮的牛，这家伙太欺负人啦！我今天砍了他的牛，看他能把我咋的！”

只擦掉了一块皮。

爹一見伤了楊扒皮的牛，可吓坏了，忙擋住大哥，嚷道：“你瘋了，你不看看这是誰的牛，惹得起嗎！”

大哥因为沒砍死牛正在窝火，气憤地說：“我知道这是楊扒皮的牛，这家伙太欺負人啦！我今天砍了他的牛，看他能把我咋的！”

这一天的活沒干完，爹就和哥哥从地里回来了。刚刚进屋，楊扒皮帶着一帮打手，牵着牛，气势凶凶地闖进了我們家，指着爹罵：“老石头，我的牛吃了你几棵麦子，就犯得上这样下毒手？你这明明是打牛欺主！”

爹一見楊扒皮这个凶样，只得連連賠不是。大哥在一旁气的实在忍不住了，說：“你別尽說一面理！光看着打你的牛，怎么不看看你的牛吃了多少麦子？”

楊扒皮冷笑着說：“吃你的麦子？那五亩麦子全吃了才值几个錢？我这牛是用一百块白花花的大洋从云南买来的，要是有个好歹，你姓石的把家神土地一起卖了也賠不起！”

爹望了一眼那头花牛，惊住了。刚才那牛只擦破了块皮，現在怎么成了半尺多长的口子呢？忙說：“东家，这牛沒伤这么重啊！”

大哥看見牛的伤也来火了，气憤地說：“用鑿头怎么能打出这样的口子？这明明是你自己用刀划的，想訛人！”

楊扒皮一看他的阴謀被哥哥揭穿了，就蛮不讲理地說：“你們打伤牛还不讲理，好！有讲理的地方。咱得到县衙門打官司！”說完一甩手走了。

在旧社会穷人怎么敢跟富人到衙門去打官司，穷人打官

司准輸。

在香炉寨誰不知道楊扒皮是个吃活人不吐骨头、跺一脚地乱顛的家伙呀！村里人一多半是他的佃戶，他又当着保长，財大势大，在村子里横行霸道，說一不二。他最狠的一手就是“打官司”，他要和誰家过不去，一张紙条就让你家破人亡。就在这年春天，村里崔老二有四亩好地，他看上了眼，硬說崔老二死去十年的爷爷借过他十块钱，一张紙条告到县里，县衙門把崔老二抓去打的死去活来，硬把那四亩地霸占去了。崔老二一气上了吊。爹一想起崔老二，就吓得渾身直打哆嗦。

一家人听說楊扒皮要到县衙門去打官司，愁得連飯都吃不下。只有大哥悶着头闖进闖出。

当天夜里，全家人正在担惊害怕的时候，忽然听见外面狗咬，媽媽順着窗縫往外一看，只見一群人举着火把朝我家走来。媽媽忙說：“楊扒皮領着人来了！”

爹一听这話就忙催着哥哥逃，哥哥說什么也不逃，他說：“楊扒皮成心想霸占咱那五亩麦子，咱理不屈，怕什么！”

楊扒皮領着两个警察和一群打手闖进了我家。他用火把往爹脸上一照，对警察說：“他就是石安同！”

沒容爹分辯，两个警察就把爹綁上了。大哥上前一把拉住警察的手說：“放开我爹！牛是我打的，要人我去！”

楊扒皮拿火把又往大哥脸上一照說：“你也跑不了！把这小子也綁起来！”

几个狗腿子应声向大哥扑了去，大哥拚命同他們撕打，可是他們人多，把大哥也綁了起来。爹气愤地說：“保长，吃官司，坐监牢，有我一人頂了，抓他做甚么？”

楊扒皮獰笑着說：“抓老的吃官司，抓少的去當兵。”

一家人扑上去，哭喊着，拉住不放。媽媽被警察一槍托打倒在地上。幾個警察和打手把爹和哥哥帶走了。

爹被關在黑牢里整整兩天，才被提出來審問。上了堂，“法官”不管青紅皂白，硬說爹為泄私恨，故意用刀傷牛，叫爹賠償損失。爹雖然連連叫屈，可是“法官”硬是不聽，最後還說爹無理取鬧，無法無天，把爹打了一頓，給轰了出來。

這場官司就這樣輸了。

我們家窮的連飯都吃不飽，上哪弄錢賠楊扒皮的“損失”，只好眼睜睜地看着楊扒皮領着人把那五畝金黃的麥子割走了。

眼看着就要到嘴的麥子被人家搶走了，一年來的心血白費了，全家人抱頭大哭了一場。

越來越冷了，哥哥一點音信也沒有，一家大小張着嘴要吃的，爹沒辦法，只好又挑起那副破挑子，離開了香爐寨，逃荒到別處。

石思堂 口述

龐連杰 整理

選自吉林人民出版社《牢記血淚仇》

忘不掉的冤仇

一九六二年，夏末秋初，湖南省沅江县洞庭紅公社的社員們，望着即將收割的稻谷，不由地想起了十七年前發生在重華垸洞庭澱的一段悲慘的往事。

事情發生在一九四五年。這一年，正是八年抗戰的最後一年。淪陷在日本侵略者鐵蹄下的洞庭湖區的農民，經過戰爭的破壞，更受不住封建地主的殘酷剝削和壓迫了。因此，日益增長着強烈的反抗和不滿情緒。蔣介石匪幫為了奪取抗日戰爭勝利的果實，騙取人心，抗戰勝利後，便假惺惺地在報紙上公布了所謂“二五減租”和“三七五限租”的法令。重華垸的農民，一時沒能識破國民黨反動派的本质，受了這一紙空文的欺騙，就聯合起來和當地的惡霸地主打“官司”，要求減租。最後不但“官司”打輸了，而且許多人被弄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官司”是被迫打起來的

解放前，重華垸和洞庭湖上的許多堤垸一樣，原是一片長滿荒草和蘆葦的荒洲。早在一九四三年冬，當地的惡霸地主黃鶴、胡懋生、向陽等，就仗着自己的封建勢力，霸管湖洲，盜挽堤垸，招來很多農民在這裡落戶，給他們當佃戶。經過一個冬春，堤修起來了，荒地也開墾了。可是，只種了一年，到一九

四五年夏天，就遇到大旱，田土龟裂，颗粒无收。在这灾荒年月里，狠心的地主，不顾农民的死活，反而逼迫佃户们加租。原来佃户们在这里开荒落户的时候，每亩水田就加过租谷一担，第二年又加了一担一斗五升，这次地主又提出每亩田加租谷七斗五升，佃户们真是没法儿再活下去了。

佃户们开始是苦苦哀求，希望地主们发“善心”，减免租谷。他们选出了自己的代表龙石泉、陈桂生、吴石林等十人，向地主交涉。可是，地主们不但不加理睬，反指着佃户代表打桌拍椅地破口大骂：“交租加租是自古以来的‘王法’，哪个胆敢违抗，就依法办理！”过了几天，佃户们又派出代表，在附近的一个小集镇北港子酒馆里请了几桌酒席，约请地主协商解决，地主们又拒绝了。第二天，佃户们把酒席特意摆到地主们的办事机关——堤务局里，并派了几乘轿子，想把堤务局的一些“老爷”们接来。可是那些狡猾的吸血鬼，却又一个个地避开了。他们说：“吃了茶，沾了牙，吃了酒，沾了手。”正面交涉不成，请客协商又无结果，堤务局的枪兵，却在东家催、西家索，弄得家家鸡飞狗跳墙，大家都走投无路了。就在这个时候，不知是谁从县里听来了一个消息，说是伪省政府为解决东佃纠纷，减轻佃户负担，打算实行“二五减租”和“三七五限租”。人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集会商谈，便把希望寄托在“政府”的“法令”上，决定把减免租谷的事，告发到官府里去。

常言道：“官府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佃户们和地主打“官司”，本来没有多大信心。不少好心的亲友就劝告过佃户代表吴石林，他们说：“石林呀，不要和那些有钱人打官

司吧！他們都是些霸山霸水的人。人家朝里有人，官官相护，官司打进去，还不是‘背鼓进庙門’——自找苦吃嗎！打这样的官司，我們佃戶是只有亏吃的。”佃戶代表經再三研究，觉得这场官司凭錢凭势确实打不贏，但是一想到如今“政府”既明令减租减庄，凭“理”凭“法”还是可以和他們打的。再說，协商不成，交涉无效，枪兵逼迫，怎么办呢？大家就这样抱着侥幸心理，硬着头皮把地主勒逼加租的事提起訴訟。

法官不传被告出庭

“官司”打到了官府。佃戶代表龙石泉、陈桂生、吳石林等十多人，受着全垅二千多戶佃戶的委托，远涉洞庭，来到县城。他們住不起旅館，就自带行李伙食，在一个破旧的古老的文庙里住下。一张、两张、三张稟帖呈上去了，一直沒有传訊，人們心急如焚，摸不清官府的葫芦里究竟是卖的什么药。于是又呈上了第四张十万火急的状紙。伪县政府在佃戶們的逼迫下，不得不开庭了。可是，这却是一次奇怪的审判。人們明明看見恶霸地主胡懋生已来到县城，歇脚在資江商号，而出席法庭的，却只有原告的佃戶代表，沒有被告的地主。当一个名叫蕭钟的法官把佃戶代表一一訊問后，佃戶代表中就走出一位身材矮小、精明能干的中年妇女。她是貧农魏汉生的妻子，乡里人都叫她魏滿媵。她对連递三次状紙，官府一再拖延，本就不滿，一見正式开庭，被告地主又不到堂，心中更是恼怒。于是，把手一揚，从容不迫地走上法庭，劈面就质問法官：“請問法官，我們的案子已經递了三次稟帖，为什么不受理，不传訊？”



魏滿嫉馳大聲喊道：“一不傳訊對案，二不宜判批下，三不批准上訴，那就是得賄埋冤！我們要連法官一起告……”

法官只是輕蔑地把她全身打量一下，並沒有開言。

魏滿媿馳接着又說：“請求法官把地主胡懋生傳來對案。”

“他沒有來！”

“他為什麼不到案？為什麼法院傳我們佃戶就來了？”

“他……他有事，離不開身。”

“他有事，難道我們沒事！胡懋生既不到堂，就請法官很快把案子批下！”

“哼，……批案子有這麼容易！”

“既不批下，就該讓我們提起上訴！”

“……”

一連几問，這位蕭法官都只是含含糊糊，不正面作答。魏滿媿馳火更大了，她索性放高嗓子，大聲喊道：“一不傳訊對案，二不宣判批下，三不批准上訴，那就是得賄埋冤！我們要連法官一起告……”

這個“告”字剛一落音，只見蕭法官的臉色立刻紅的象豬血一般，接着，裝腔作勢地把“驚堂木”往桌台上重重地一拍，吩咐左右道：“暫時退堂！”

資江商號密謀行賄

“官司”怎能這樣打呢？佃戶代表們想其中定有原因。當天下午，他們見蕭法官匆匆走出偽縣政府，就派出這個機警的魏滿媿馳隨後“掉尾綫”，跟踪着蕭法官，趕到惡霸胡懋生歇腳的資江商號。魏滿媿馳過去在縣城里做過女工，和商號的人很熟悉，一進門，她從板壁的細縫里就偷聽到蕭法官和胡懋生的一段對話：

“胡大老爷，幸亏今天你没有到堂，这些佃户代表可真不好对付呀！特别是那个魏满猷，那张嘴真厉害！”

“啊，就是那个贱人，不碍大事。我们再拖一拖，再冷他们一把火。”

“再拖，怕不行吧？上面已有明令实行‘二五减租’和‘三七五限租’，如果再不判，他们就连我也要一起上告了。”

“哼！”胡懋生鼻子里出了一声粗气，拍着萧法官的肩，亲暱地说：“没关系，你先回去。我回到局里自有办法收拾这班穷鬼！”接着，他们交头接耳地密谈起来。

据事后佃户们了解，胡懋生为打这场“官司”花了不少钱。仅托资江商号的店主刘岳生，就送给萧钟一大叠伪币、两段绸料和一张二百担谷的条子。这就是法官不传被告出庭，对佃户们正义的控诉，一拖再拖的原因。地主们不但设法把“官司”拖下来，为了向佃户报复，还想出了一个更大的毒计。

恶霸地主的毒计

这一年农历十二月十八日的深夜，忽然在洞庭湖靠大堤的一条沟港旁，发现了一具无名尸首。第二天清早，人们很快就从垸里“首事”们口中听来一个讯息，说这个尸首就是当地的保长易辉。于是，“易辉被暗杀”的风声飞快地传遍了全垸。

易辉怎样被“暗杀”的呢？据东丰乡乡长、堤务局“外交主任”向垸宣布，是佃户代表龙石泉等人“杀害”的。可是，就在发现“易辉尸首”的前一天晚上，重华垸对河的另一荒洲上，却失去了一具邵阳籍在那里修堤的“土夫子”的尸体。这个“土夫子”原是个裁缝，最近突然病死了。重华垸堤务局的头目黄

鶴、胡懋生、向阳等人，就暗中花了一百担谷，把尸体买来，假冒易輝。而真的易輝呢，則早已由堤务局送給他一张两百亩田的字据，和一批現款，远走高飞了。

易輝的“尸体”被发現后，伪县政府煞有介事地派来了驗尸的“仵作”，勘驗了尸首，证明确系“暗杀”，因死者頸上有一条两分深的刀伤。二十一日上午，从大堤上就开来了一大队荷枪实弹的軍警。走在前头的是一乘专轎，轎上坐着伪乡长兼堤务局“外交主任”向阳。他的背后是一匹高头白馬，馬上馱着尸首，尸首下面安放着一个灌滿猪血的袋子，上面用麻袋复盖着。馬匹馱着尸首，袋子里的猪血就一滴一滴地往外流，队伍直奔佃戶代表龙石泉家而来。到龙家以后，向阳叫把尸首停放在龙家堂屋里，当众宣布：杀人抵命，欠債还錢。枪兵們把龙家左右团团围住，灾禍降到佃戶們的头上。

地主豪紳們为把这假戏演真，紛紛赶来“吊丧”，表示对保长的哀悼。这些天，堤务局整天开着“流水席”，局里的“首事”們如同死了亲爹亲媽。恶霸地主胡懋生还特地叫人到綢布店买了三丈上等的紅色綾綢把尸首裹着，花了七十六担谷子买来一副黑漆棺材，請来一些道士敲鑼打鼓地做了三天“道場”。伪保长易輝的妻子易王氏，更是装模作样地哭得死去活来。易姓的家族們也都被堤务局收买，到龙家来胡鬧。主持这场“丧事”的，是堤务局請来的一位在熙安乡当乡长的易志祥的弟弟，外号叫“易毛伢子”的流氓。这些天来，他特別神气，腰上挂着一支左輪手枪，凶神恶煞似地指着佃戶們說：“这是你們佃戶杀了我易家的人。杀人要抵命。要不，老子的‘鸡腿巴子’（指枪）也是不认得人的！”

假尸首的秘密揭穿了

对地主豪紳們导演的这幕毒辣的移尸陷害的丑剧，佃戶們心里是明白的。但这样一来，反对地主加租的原告，就变成“杀人”的被告了。怎样戳穿这阴谋呢？事情也凑巧，正当胡懋生买来綫綑和棺材，而枪兵們在附近又找不着“內行”的人装殮尸首的时候，群众有意地推荐了那位机警的魏滿姨来干这差使。当她走近尸首一看，尸首的面部血肉模糊，頸上确有刀伤，很难辨认；再看装束，也十分象易輝平时的打扮：穿着一件学生蓝罩袍，棉袍是綫春面，駝絨里子。于是她加倍小心，仔細观察尸体的各个部分。忽然，她灵机一动，拉着尸首右手的中指仔細端詳，终于发现这手指的侧面，有一个异乎寻常的記号：一层特别坚硬的手茧。她想：“这不就是一个裁縫拿頂針的手指嗎？”接着，她擦洗尸体时，又发现死者的腰上系着一根麻绳。她心里一怔：易保长平时是最讲究穿戴的，为什么临死前却要拿一根麻绳当裤带呢？她又摸了摸死者的头部，发现死者的头发长长的，看样子是很久沒有理发了。可是她記起：許多人都說易保长在出事的前两天，还在一个姓何的理发师手里剃过一个“陆軍头”呀！这样仔細一检查，真是破綻百出。就这样佃戶們终于弄清楚了这个尸首的来历。

真假易輝的秘密被揭穿后，佃戶們又商量告状。风声传到堤务局的恶霸地主們的耳朵里，他們又連忙开会計議，决定調派軍警，把尸首赶快轉移。

如果让假易輝的尸首轉移了，一場人命官司就会死无对证。佃戶們听說地主准备移尸，决心保卫这尸首作证据。他們



佃戶們聽說地主準備移尸，決心保衛這尸首作證據。他們大聲嚷着：“尸首堅決不能搬，是真是假要弄清楚！”

大声嚷着：“尸首坚决不能搬，是真是假要弄清楚！”这样，一方是地主坚决夺尸，一方是佃户坚决守尸，两方便械斗起来。佃户们在村前村后聚集了几百名青壮年，有的拿锄头，有的拿扁担，一齐赶来守卫，尸首才没有让地主派来的军警抢走。

农民的血海深仇

尸首虽没有被抢走，恶霸地主们却恼羞成怒了。

就在尸首停放在龙石泉家前后十天的时间内，整个堤垸一直处在紧张、恐怖和阴郁的气氛里。地主雇来的几十名反动军警在乡里翻箱倒柜，四处搜捕。他们见到漂亮的女人就奸淫，好的东西就抢劫。地主们捉不到龙石泉等佃户代表，就把龙石泉的妻子，抓到堤务局严刑毒打，打得她遍体鳞伤，不省人事。佃户代表吴石林被反动军队追赶到二三十里外的茅柴丛中，两颗子弹，一颗从他头发上擦去，另一颗从右耳边掠过，险些丧了性命。更可耻的是，这些吃人的野兽兵，竟然想强奸一个身怀有孕的妇女，强奸未遂，就一记耳光把她打倒在那具尸首的旁边，使她长期患了精神病。佃户陈桂生对于当时受害情况的控诉使人听了更触目惊心。他说：

“记得，当洲子上发生了那个假易辉尸首的案子后，我们几个为首的佃户代表都跑了，伪军警捉拿不到我们，就跑到我家，把我父亲陈喜廷、弟弟陈桂云、陈桂华和一个当时只有十四岁的妹子陈满秀，连同洲子上的其他二十多个佃户，一起抓到堤务局。在局里，大家被踩过杠子，坐了老虎凳，斗了香火，灌过辣椒水。这还不算，恶霸向阳一看大家都没有招供，第二天他就暗地许了一百担谷子给当时伪阳罗洲警察所所长

文广勛，把我父亲和弟弟、妹妹，又押解到那里。当时正是严冬，那些杀千刀的警兵，不由分說，把我父亲的棉衣脫光，用枪打过，又踩杠子，硬逼着他說出杀死易輝的是我們佃戶代表。我弟弟陈桂华，受了两次苦刑，背上被打出七个血洞，在牢里找不到药物，他就用伪法币把这七个伤口貼上。我妹子滿秀也被打得九死一生。我六十多岁的老父亲忍受不住这样的刑罰，两天粒米不沾，茶飯不思，一天到晚只是哀叫。可是，就这样，那个灭絕人性的文广勛，也沒饒过他，在当天的深夜，竟把我父亲拖到一口池塘里，給活活地淹死了。

我听到父亲被打死的訊息，連忙赶到阳罗洲伪警察所，当着文广勛喊冤。可是这个狼心狗肺的家伙，用一个金戒指买通了前来办案的伪县府蕭法官，一見我的面，就不由分說，把我捆綁起来，当天解到了伪县政府。这天，正是旧历大年初一，人家欢欢喜喜过年，我家堂屋里却停放着我父亲的尸体，一家人死的死，伤的伤，关的关，真是惨极了！

这以后，这场“官司”一直拖了三年多，真假人命案件混在一团，佃戶們有冤沒处訴，有苦不敢言。結果，无辜受屈的佃戶代表，除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以外，每个人还被捉去白白地受了几个月的牢獄之灾；而真正的杀人凶手，却一直逍遙法外。佃戶們經過这场“官司”懂得了：蔣介石的政权与恶霸地主們是一个鼻孔出气的；对这些乡里的、县里的、省里的大大小的“蔣介石”們，决不能存在絲毫幻想！

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佃戶們一直到解放后經過土地改革运动，才申了冤，报了

仇。人民政府根据群众的要求，枪毙了大恶霸地主胡懋生、向阳等人，另一个大头目黄鹤，也判处了劳改。现在，那具假易辉的尸体，仍然埋在农民龙石泉堂屋的旧址上，它已成了一个最好的历史见证！

往事不堪回首。今年已经五十七岁的吴石林，当他想起过去这些悲惨的往事，非常感慨地说：“我已经是两世人了。幸喜到了新社会，如果不是来了共产党和毛主席，我们农民的冤仇，万年也洗不掉，永世莫想翻身！”吴石林，现在是洞庭红人民公社和平大队第十生产队的会计员，他说：“我现在虽说老了，可是我的心没有老。为了报答党和毛主席的恩情，我只有心一意使劲搞好队里的生产。”贫农陈桂生，也是一个五十岁的老人了，解放前一直当长工，五十年的生活经历，使他深刻地认识了一个真理，他说：“世界上真正替我们穷人说话做事的只有共产党，我们农民只有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才有出路。”现在，他家里有六个小孩，连他们老两口共八口人吃茶饭，尽管人多劳少，但因为每年都得到政府和人民公社的照顾，生活过得也很好。他经常对儿女们说：“孩子呀！你们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啊！谁把我们农民当牛马，谁把我们弄得家破人亡，这笔账要找恶霸地主的总头子蒋介石去算。”

是的，我们永远不应当忘记过去，永远不应当忘记阶级斗争。

（危正初）

选自湖南人民出版社《血海深仇》